战略视角

当前的世界经济怎么了

□陈江生

2014年下半年，世界经济突然给出了令许多人颇感意外的数据。首先是油价暴跌，国际原油价格6月份的时候还是100多美元一桶，到了年底却已经掉到了每桶50多美元，跌去了一半。其次是卢布暴跌，上半年，卢布还徘徊在30到35卢布兑1美元，到了冬天，却跌到了50多卢布兑1美元，12月中旬甚至还跌破过80卢布兑1美元。再次是美国经济增速创下11年新高，2014年3季度美国GDP增速达到了5%。看着这些数字，人们不禁要问，当前的世界经济怎么了？中国会怎样？

关于原油暴跌

阴谋论者认为，油价暴跌是美国一手策划的。他们认为，为了惩罚俄罗斯在乌克兰问题上的所作所为，美国联合多国对俄罗斯实施制裁，除了公布的那些措施之外，还打压石油价格。因为只要把原油的价格压下来了，俄罗斯的经济就会崩溃，俄罗斯就会退让。于是，美国故意压低石油价格。另一类阴谋论者认为，油价暴跌是沙特们的诡计。因为对于常规石油生产者来说，最大的对手是页岩油的生产者，而页岩油的生产成本大约六七十美元一桶。因此为了把页岩油赶出市场，以沙特为首的石油生产商故意压低石油价格。

事情真的是这样吗？恐怕要复杂得多。第一，考虑世界经济的问题，必须先看大势。国际油价的涨跌和世界经济的大趋势是紧密相关的。第二，考虑世界经济问题，应该坚持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世界经济决定世界政治。只有这样才能够更全面一些。第三，当然也不能忘记世界政治对世界经济是有反作用的。认识世界经济的变化，不考虑世界政治的变化不行。

冷战结束后世界经济的大趋势无疑是经济全球化的大发展，表现为资本、技术、管理等资源的全球配置和扩散，导致了部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崛起。只是这个结果在2008年以前因牙买加体系的缺陷而被名义货币估值等假象所掩盖和约束。但是，被掩盖和约束，并不意味着名义向真实回归的力量不存在。而且，当这个力量达到一定程度，因制度缺陷而产生的假象对真实的掩盖必然会被冲破。“回归”从台下上到了台面。只是这个过程颇为痛苦。无论是美国的“次贷危机”，2008—2009年的国际金融危机，还是2010—2012年的“欧债危机”，都是“回归”过程中带来的破坏，是经济现实对制度缺陷的报复。为了减少各种危机的损失，世界各国纷纷出手试图稳定局势，这包括了中国的“四万亿”，美国的QE，日本的“安倍经济学”，“欧债危机”的救援等等措施。但我们必须清楚的是：第一，这些都只是缓解痛苦之策，是带着三分毒的药；第二，名义财富向真实财富回归是一个必然趋势，偏离得越远，回归时的痛苦会越大；第三，部分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崛起是世界和平、经济全球化的成果，只要基础条件不变，这些发展中国家还会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以快于世界平均水平的速度发展。

在这样的大趋势下，油价在各种力量的作用下经历了1999年到2008年的持续上涨，是顺势的。但是，如果没有牙买加体系的制度缺陷，能涨成那样吗？在一定意义上，这种顺势推高是对包括高速增长国家在内的石油消费大国们征收石油特别税。不仅是石油，其他大宗商品在这阶段都大涨特涨，抑制的就是高速增长大国的发展。这不，沙特的大臣最近说，实际上他们原油的生产成本是几个美元。也就是说，他只要卖个十几二十美元的，就大赚了。当然世界原油生产的平均成本不可能只有几个美元一桶，但就算要十多个美元一桶，这个顺势也还是顺势推得太高了，100多美元一桶啊！当然，这影响不了世界经济的大势。只是为积蓄“回归”的能量多尽了一分力量而已。

在这样的大趋势下，虽然在世界经济因再平衡开始而导致危机，油价出现了2008年底至2009年初的暴跌，但是各国狂吃了一通“金融止痛片”后，油价也就顺势重新走高。但是，真的应该走得那么高吗？当然不应该，但也可以理解为这只是再一次为“回归”积蓄力量。因为，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在世界和平、经济科技进步迅速的当代，一个商品的高额利润是不可能长期保持的，尤其这个利润率已经高到了百分之几百。替代品一定早就跃跃欲试了。当“四万亿”结束了，QE结束了，“欧债危机”结束了，“回归”的力量一定会追问石油的高额利润是否真的是即期需求和供给平衡的必然。更何况，经过十多年的准备，替代品当然要出来瓜分超高利润了。如果不是页岩油，也一定会有其他替代品；不是2014年，也逃不过2015年、2016年的。

关于卢布暴跌

有了上述基本判断，我们也就很容易理解卢布的暴跌了。“回归”是回归什么呢？当然是从虚高的名义价值向实际价值回归了，油价是虚高，把自己的价格定到了远远高于成本的位置上，并在各种力量的作用下，持续坚持在高位。于是终于在各种力量的作用下下来了。俄罗斯经济呢？是不是也同样存在虚高问题？

如果我们剔除政治考虑专心看经济，我们的回答就会是“是的”。俄罗斯的什么产品在世界上有竞争力？当然只有能源资源和军火。虽然普京送给习近平总书记的手机也很好，但是在世界市场上占了多大份额？俄罗斯没有阿里巴巴、苹果、孟山都和辉瑞，也没有富士康、小米、格力和华为，连7亿吨钢铁、20亿吨水泥、5亿吨粮食的产能和市场都没有。这样的经济体能源资源和军火的估值当然在所有资产的估值中起决定性的作用了。其结果是：如果这两者在世界上的估值高了，整个经济体的估值也就高了；如果两者的估值低了，整个经济体的估值也就下来了。因为军火在经济中的比重实在不大，因此俄罗斯经济是否虚高便决定于能源资源的估值是否虚高。既然如此，当人们发现能源资源的价格跌去了很大一部分的时候，卢布会发生什么可想而知。

当然世界政治对世界经济的反作用也不能忘记了。要说估值出了问题，虚高就要立即“回归”本也并不尽然。为了避免短期了爆发“回归”造成巨大痛苦，世界实际上已经准备了很好的缓冲机制。因此，即使是国际金融危机那么大的冲击，通过世界各大经济体分头以金融手段为国际金融危机“托市”，破坏也被减少到了最小；对付“欧债危机”时也是各国纷纷相助，硬生生阻止了“欧猪五国”的崩溃，欧盟还干脆为五国吸掉了大部分危机能量。但是，俄罗斯却没那么幸运。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不仅没有给俄罗斯提供一点帮助，反而还不断加大对俄罗斯的制裁幅度，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在政治的推波助澜下，短期“回归”，卢布怎能不面临断崖。还好，除了西方阵营以外，现在也还有了其他力量，所以卢布应该能够稳定一阵。但因为现在的世界经济仍然是美国主导的世界经济，俄罗斯经济本身又确实存在问题，因此，如果西方阵营加大政治和经济力量的使用，卢布再下一个台阶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关于美国和中国的经济增速

依据同样的逻辑，我们再来看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美国和中国。

首先是美国目前的繁荣。5%是一个可持续的增长速度吗？当然不是。一方面，美国是全球化的推动者和得益者，但与世界上其他从全球化中获得好处的国家不同，美国得到的好处更多的是依据其在世界经济中的特殊地位，通过早就设定的制度来获得的。比如通过美元向全世界征收了无数的铸币税，而且全球化越发展，使用美元越多，美国得益就越大。另一方面，因为美国是世界科学技术、经济手段最大的发明者，是许多成熟管理模式的拥有者，使得他除了自己通过高投入创造出来，很难通过引进来实现发展。因此，即使包括20世纪90年代的战后最长繁荣时期（1992—2000年均增长率高达3.8%），冷战结束23年以来美国的年均经济增速也不过2.5%多一点。由于我们看不到美国任何能在未来十年达到1990年代那9年繁荣的可能性，因此，只能把当前的繁荣看作危机后的报复性反弹。若论持续，未来十年顶多也就会有个年均3%左右。

再来看中国。与美国一样，中国也从经济全球化中得到了很大的好处。但同美国不一样的是，中国之所得来自于自身的制度改进和经济要素投入，而非收取好处费。因此，看中国经济发展就得看这两个方面。从制度改进方面看，中国1978—2012年的改革对应的是约10%的增长，当然这是和人口红利，技术引进，高储蓄、高投入联系在一起的。由于中国从2013年又展开了一轮新的更全面深刻的改革，这一轮新的改革所能带来的新的正面效应应该不小于上一轮。因此，对比便主要转移到了经济要素方面。显然，中国的人口红利在未来十年将进入持平并略有下降，与前三十年的不断增长相比是不如的。储蓄、投入增长速度也不会比前三十年差，引进技术方面也还有一定余地。但环境容量的余地和前三十年已经无法相比，因此增长只能更多地依赖于产业结构的提升，这就预设了比前三十年高得多的成本。这些叠加的结果是，未来十年中国经济还会高速增长，但这个高速是“新常态”下的高速，大约会比前三十年的平均增速低3个百分点左右。

我们相信，未来的2015年会比2014年稳定得多，美国虽然难以达到年增5%的增速，但继续复苏是可见的。中国经济虽然还会面临许多成长中的烦恼，但在“新常态”下“稳中求进”一点问题都没有。在美国的带动下，欧盟的经济同样会转好。为了不往下走，日本会不断自我刺激，以待更远的未来经济对刺激麻木。由于2015年还不至于麻木，因此日本经济也会延续2014年的状况。麻烦的是各能源资源出口大国。好在这些国家实际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并不大，全加起来也到不了10%，在世界已经有了2014年底的心理准备之后，他们的麻烦已经不可能对世界经济造成太大的冲击。

警惕世界经济战“常态化”

□陈建奇 张 原

世界各国由于自然禀赋、发展水平等差异而促使竞争无处不在，传统经济社会中大国经常借助军事扩张、殖民地管理等手段进行激烈较量，打开封闭国家的大门，据此在全球资源配置中占据有利位置。当今核武器的出现客观上使得大国间全面军事战争受到较多克制，但世界各国之间的非常规较量并未停止，世界经济战成为现代社会的重要现象。

世界经济战形式复杂多样

世界经济战为经济竞争贴上“战争”的标签，意指世界主要国家出现非合作的违背国际规则的非常规竞争，实质上是世界某些国家采取对全球经济社会具有强烈负面溢出效应的政策、措施、手段。世界经济战并非强调世界各国的共同行动，更侧重某些国家非常规举措的负面冲击具有全球性影响。世界经济战并不存在固定的模式，而是伴随当代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不断调整的，世界经济战呈现出复杂多样性。

从需求层面看，市场份额战是突出的形式，主要表现为某些主要经济体通过提高关税、限制资本流动等手段抬高本国贸易投资壁垒，由此希望提升各自国家的企业在本国市场的份额。同时，世界主要国家通过增加商品补贴、压低汇率等手段压低本国商品价格，期待拓展全球市场。从供给层面看，掌控原油、粮食等生产生活材料的大宗商品供应成为世界经济战的焦点，世界主要国家既争相获取大宗商品价格的定价权，又期待通过联合盟友垄断大宗商品的供给，由此对大宗商品进口国构成潜在的制约。

货币金融是世界经济战的核心

尽管世界经济战的手段异常繁多，但就其核心来说，货币金融是最核心的领域，曾经有两位名人对此作出了重要的论断。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指出：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了所有国家；如果你控制了粮食，你就控制了所有的人；如果你控制了货币，你就控制了世界。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也提出，要颠覆现存社会的基础，再没有比搞坏这个社会的货币更微妙且更保险的方式了。货币金融话语权已成为世界大国竞相争夺的焦点。在当前持续发酵的乌克兰事件中，欧美主要通过国际金融市场制裁俄罗斯，诱发俄罗斯卢布危机等风险不断升级。

欧美能够通过货币金融等手段使俄罗斯陷入困境，表面上是俄罗斯在乌克兰事件中的孤立无援，实质上是美欧掌控全球货币金融话语权的结果。1944年美国主导召集44个国家的经济特使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商讨战后体系，形成了以布雷顿森林协定为基础的现代国际经济金融秩序，确立了美元主导国际货币体系的“美元双挂钩体系”，创建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世界银行两大国际金融机构。其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由欧洲人担任，世界银行总裁由美国人担任，体现了美欧在现代国际经济金融秩序中的主导地位。

20世纪70年代美元危机终结了“美元双挂钩体系”，但当时爆发的石油危机、经济滞涨等问题促使发达大国再次抱团，全球治理由美国独霸转为美国主导G7集团的治理模式，美元、欧元（欧元之前德国马克是主要的国际货币）、日元、英镑占据外汇储备份额95%左右。美欧主导国际经济金融秩序使其在世界经济战中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全球规则倾向于维护美欧等发达大国的利益。

全球化助推美欧掌控世界经济战的主导权

美欧拥有全球秩序话语权并不意味着美欧可以借助世界经济战形式获得竞争优势，这需要两个很重要的前提。

一方面，必须让世界大多数国家接受美欧创造的全球秩序，才能保证该体系具有较大的影响范围。冷战时期，苏联集团徘徊于体系之外显然让该体系有失完整性。近30多年来国际经济金融环境出现显著变化，20世纪80年代以来苏联解体、东西德合并以及原社会主义国家向市场经济的转型，特别是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原来受苏联影响实施计划经济的国家开始逐步加入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使欧美主导的全球秩序变得“名副其实”。

另一方面，必须让世界各国在欧美主导的全球秩序下深度合作，才能保证该体系具有较强的影响力。近年来国际经济合作深化主要体现在贸易全球化、金融全球化和生产全球化的深度发展。截至2014年6月WTO共有160个成员，覆盖全球98%以上的国际贸易。同时，以专业化分工为代表的生产全球化不断发展，全球分工从产业间向产业内、产品内分工演变。国际资本跨境加速流动，全球外商直接投资额2007年较1970年增长160倍，私人资本频繁大规模流动，资本配置效率持续提高。国际经济合作深化，客观上增大了欧美主导的全球秩序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警惕世界经济战“常态化”

尽管全球经济自2010年以来呈现复苏增长态势，但世界主要国家宏观政策却持续分化。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诉诸非常规的量化宽松政策，促使国际资本跨境急剧大规模流动，引发巴西、南非、印尼等新兴经济体汇率大幅震荡及国际金融风险上升。发达经济体多年来的政策举措已经构成了世界经济战的特征：一方面，量化宽松政策有助于压低自身货币汇率获得非常规的竞争优势；另一方面，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调整对全球汇率等国际金融稳定性产生较大的负面溢出效应。

潜在的问题是，引发世界经济战不仅使得发达经济体受到谴责，世界经济还将面临更加困难的局面。为何发达经济体要诉之于世界经济战呢？主要的原因在于，世界主要经济体自2010年以来出现持续分化局面。美国经济经历多年缓慢复苏而呈现逐步改善迹象，欧洲经济持续低迷，日本安倍经济学助推日本经济短期复苏但又重陷衰退。危机以来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的主引擎新兴经济体也呈现减速分化现象。在此背景下，世界各国不再像金融危机初期那样抱团，发达经济体疲软的经济状况促使其采取以非常规量化宽松政策为代表的世界经济战，新兴及发展中经济体由于在现有体系中缺乏话语权而处于被动，推动欧美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调整的诉求在新兴经济体中持续增强。

伴随美国退出量化宽松政策，世界经济战出现了缓和的迹象。然而，去年底以来，乌克兰等地缘政治问题持续发酵，俄罗斯经济由于欧美制裁而引发经济危机的风险陡然上升，制裁等极端世界经济战形式再度受到世界关注。当前全球经济进入持续分化的新常态，欧美与俄罗斯双向制裁加大世界经济战呈现常态化的风险，由此引发外界对全球经济不确定性的担忧。如果双方制裁进一步升级，欧美可能冻结包括外汇储备在内的俄罗斯外部资产，那么俄罗斯干预外汇市场或者其他金融市场的能力将大幅减弱，在此情况下，俄罗斯可能采取中断向外天然气输送等报复性措施，由此滋生的世界经济战可能失控，全球经济将遭受较大负面冲击。因此，创新国际经济协调机制，倡导各国加强合作而非制裁的措施，避免世界经济战常态化的局面，是促进全球经济持续稳步复苏增长的关键所在。

热点透析

中拉整体合作乘势起航

□杨志敏

日前，随着首届“中国—拉共体论坛”部长级会议的举行，“拉美”已经成为一个热词，但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拉美似乎还相当陌生。也许对于拉美的陌生来自于中拉相距遥远，但事实上，它与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正越走越近。今天，或许我们正在品尝的葡萄酒、食用的香蕉、炒菜的植物油、早餐的面包就分别产自智利、厄瓜多尔、巴西以及墨西哥在华投资企业所生产，而我们或许每天都行走在由产自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沥青铺就的马路上。所以，遥远的拉美其实离我们的生活并不遥远，恰恰就在我们身边。

拉美向我们走近并与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日益密切，正是得益于过去20余年来中拉经贸关系快速发展的这根纽带。2013年，中拉双边贸易额达到2616亿美元，中国成为拉美的第二大贸易伙伴。截至2013年底，中国对拉美的直接投资存量超过830亿美元，成为拉美的第三大投资来源地；中国累计在拉美新签工程承包合同额946亿美元，实际完成营业额544亿美元，拉美已经成为中国重要的工程承包市场。由于彼此经济结构存在高度互补性，中国和拉美成为天然的合作伙伴。

中拉双方经贸合作不仅要依靠贸易这一个因素支撑，同时还要加强投资和金融的作用，让贸易、投资和金融共同成为带领中拉经贸合作的三个引擎。就投资而言，它可以将中国4万多亿美元的巨额外汇储备的巨大优势与拉美国家在基础设施、产业升级等领域巨大需求相结合；就金融而言，自2008年底金融危机爆发后，中拉双方实施了货币互换、合作基金等一系列创新的合作方式，为彼此克服金融危机的影响、恢复经济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金融合作已经成为双方经贸合作新的亮点和增长点。

中拉经贸合作，除了需要增强“引擎”，还需要延伸“舞台”。拉美地区幅员辽阔，包括33个独立国家，可以划分为四个次区域，即北美洲地区（墨西哥）、南美洲地区、中美洲地区和加勒比地区。但以往中拉之间的贸易、投资集中度过高，存在地域不平衡性，主要是集中与南美国家之间开展。因此，今后中拉贸易需要进一步向北美、中美洲和加勒比等西半球“腹地”延伸。

当前，全球经济形势低迷，各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外部不确定性和挑战依然存在。据统计，2014年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平均经济增速仅为1.1%，是近5年来增长最低的一年。而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也在进行以“调结构、转方式”为主要内容的经济转型，深度经济改革处于进行时。双方面临的共同任务为中拉双方经贸合作方式的升级、合作方向的转型，提供了更多机遇。

中国政府一直重视并积极推动与拉美的整体合作。2008年发表了《中国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政策文件》；2012年，对中拉整体合作提出一系列倡议并宣布了一系列具体且可操作的新举措；2014年推动中国—拉美和加勒比国家领导人会晤，并发表《中国—拉美和加勒比国家领导人巴西利亚会晤联合声明》。中方的上述举措都得到了拉共体国家的积极回应。

中拉全面合作必将使双方受益。对于拉美来讲，随着中国直接投资的增加，将给当地居民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带来更多的收入；随着中国投资进入拉美的基础设施领域，不仅拉美民众将享受到高质量的交通、通讯等基础实施，其整个国家也会因为基础设施的改善而使自身的竞争力水平得以提升。此外，随着中方提出的一系列基金的启动、交流计划的深入实施，越来越多拉美人民尤其是青年人将获得更多的就业和培训机会。对中国而言，面对拉美巨大的市场和投资机会，一大批具有实力尤其是像掌握了高铁、通讯等核心技术的中资企业将更有机会走进拉美的基础设施领域等领域，获得更多的工程项目合作机会。与此同时，中拉在能源资源、基础设施建设、农业、制造业、科技创新、信息技术等六大领域的务实合作，将全面推动中拉整体合作水平。

中拉整体合作平台的建立，十分有利于彼此发展经验的分享。过去30余年，经济的快速发展已经使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在经济特区建设、各类工业园区的开发过程中积累了相当多的成功经验，而近年来拉美一些国家也在探索经济特区或工业开园区的发展模式，力图再造新的经济增长极，对中国发展经验很感兴趣。近年来，中国也已经通过引进来和走出去两种方式，与外方或是在国内或是在海外成功地建立了多种园区，可以与拉美共享发展经验。

展望中拉整体合作的未来，正像习近平主席指出的那样，“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常态，今后一个时期将继续保持中高速增长，将给包括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多市场机遇、增长机遇、投资机遇、合作机遇”。预计未来10年内，中拉双方贸易规模将达到5000亿美元、中国在拉美直接投资存量达到2500亿美元。

目前，指导未来5年中拉整体合作的1个规划已经描绘、3个引擎已经发动、6个领域的合作已经展开，在“1+3+6”框架引领下的、以中拉合作论坛为“新平台、新起点和新机遇”的中拉整体合作正乘势起航。